

## 第五章 結 論

自《威斯特伐利條約》塑造西洋國際體系以來，國際社會多呈無政府狀態，國家為圖在國際社會中立足及生存，國與國之間即須不斷透過外交手段，建立各種「安全模式」，近代以來衍生出各種形式的單極霸權或大國共治的體系結構，再依據體系的單極或多極化的層度不同，而形成軍事、經濟、政治等各種不同型式的結盟關係，衍生國際體系制度及秩序，並為體系內的國家遵循及予適度的制約，惟在現實的國際社會環境中，國家權力的強弱、國家利益的消長、國家安全的存亡，常影響到國際制度的規範，及至雅爾達體系結束前依然如此。本章將針對前面章節的論述予以歸納，列舉出後冷戰時期，中共在「十五大」後的外交策略上，夥伴關係對國際新秩序的影響、大國外交對台海及區域安全的影響，以及筆者對上述問題的發現，進行整理。

### 第一節 夥伴關係對國際秩序的影響

蘇聯瓦解導致冷戰結束後，國際環境呈現整體和平、局部和緩，尤其是區域爭端難弭的情況下，傳統性的安全問題依舊存在，但是整體的國際環境因為經濟全球化、科技傳訊發達、社會、環保、犯罪、恐怖主義等與各國之間聯動性高，形成跨國性的影響，使得各國之間出現相互依存的禍福相倚現象，是以非傳統性安全觀，依據各國國情的不同而有所取捨，發展成各種不同型態的安全觀，美國的「安全合作」、日本以經濟安全為主的「綜合安全」觀、東盟的「綜合安全」及中共的新安全觀等，並以此作為對外關係的國際政治運作訴求。

中共倡議的「新安全觀」，其宗旨係以「對話與合作」取代對抗，在相互依存的國際安全環境下，以「互利合作」尋求共同安全，並建構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之上，核心宗旨為「互信、互利、平等、協作」，另為建立地區安全對話合作機制，則積極參與「上海合作組織」和「東盟地區論壇」，並以推動「東協與中、日、韓」經濟合作組織（10+3），形成多渠道、多層次、多形式經濟合作新局面；其中「上海合作組織」是「新安全觀」的實踐成功案例，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發布的《中國防擴散白皮書》是為「新安全觀」的體現。

冷戰後的國際社會，各國為塑造和平的國際環境，不僅尋求國際體系的共同

安全，且為全力發展而經濟追求共同利益，是以亟需建立各種夥伴關係，以獲取國家的最大利益，而中共在此前提下，強調在獨立自主下的主權平等關係、安全合作下的協作關係、共同合作下的互利關係、共同安全下的互信關係，因此筆者認為，中共以此綜整為建立各種夥伴關係的依據及基準。

中共一再強調「夥伴關係」是「不對抗、不結盟、不針對第三者」的新國家關係型態，是在國際體系「多極化」的架構下，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並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及其他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下，堅持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筆者將目前中共與主要大國的夥伴關係概分以下四種，即與俄羅斯是以平等及互信為主的「戰略協作夥伴」，與歐盟及英、德、法三國是以互利及平等為主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與日本是以互利及協作為主的「友好合作夥伴」，與美國是以互信及協作為主的「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綜括而論，中共的「夥伴關係」係仍就承襲「三個世界」的主張。

國際社會中存在國與國之間的利益衝突，而國際體系內衍生的國際經濟或政治秩序，雖是國際政治權力的另一種表徵，但亦是為體系內各國得以必須遵循的規範，是以美、英等國在雅達爾體系期間，建立聯合國、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等機制，鑒於惟有融入國際體系中，才是生存之道，是故日本及德國雖然是二次大戰的戰敗國，但在融入雅爾達體系後，即因經濟發達成為經濟大國，冷戰後更積極運作成為聯合國常任安理會成員之一，俾為政治大國。

現實主義者多認為國際政治存在權力分配的現實面，而國際體制及秩序多為世界霸權掌控，或由主要大國共同掌理，而新興大國為增加國家自身的安全感，以期擴大政治、經濟方面的控制能力，而企圖改變國際體系架構使之符合特殊利益，不是成為挑戰者即為追隨者或是夥伴。

後冷戰時期，德、法、俄及日本等大國，基於國家利益多有改變國際體系之企圖，另在面對非傳統的國家安全問題時，則凸顯協商與合作，將是大國間互動關係的主要發展趨勢；而今中共以「新安全觀」作為對外關係訴求，不僅可以建立夥伴關係，促成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關係，更在不涉及雙方的核心國家利益下，從根本上遏制國際間的「中國威脅論」，依此外交戰略促成多極化世界格局，更以漸進的方式，倡議建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夥伴關係」可以是雙邊或是多邊的外交活動，此舉利於中共在國際社會中樹立大國形象，值此之故，中共不斷強調將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下，建立各種對話與合作性的夥伴機制，現為中共自組籌設者有「上海合作組織」、「博鰲論

壇」，無疑在期待建立國際政治權力及國家利益的預期目標，進而擴展國家的在國際體系中的整體影響力。

中共在「十六大」後，積極與世界、區域性主要國家及國家集團，重新架構建立新的夥伴關係，並簽署共同聲明及公報，並藉由各種經濟、政治、軍事等單獨性或是相互依存性的事件，在訴諸國家利益後，似在營造形成國際新秩序的氛圍。另中、俄兩國近年來，不斷主張以《聯合國憲章》作為處理國際事件的依據標準，強調建立國際民主機制，抵制美國霸權及西方國家的強權政治。

中共在冷戰後強力宣揚「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题，主張營造和平的國際環境以支持國家的經濟建設，近年來在經濟政策上在「引進來」之後，現主張「走出去」，不斷與各國加強與發展經濟關係，形成相互依存的經貿夥伴；對外關係上由「韜光養晦」，轉為積極的「有所作為」，結合各種外交作為，發展成國際政治的主要夥伴；顯現出政治、經貿的夥伴關係的外交策略，是為整體外交戰略的具體實踐，夥伴外交無非是在架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之工具，並以此模式蔚為國際的大氣候。

## 第二節 大國外交對亞太區域安全的影響

殷鑑可知，國際體系中的大國的興衰及演變，是國際政治互動及國際關係變遷的主要指標，地緣政治指出歐亞大陸是為世界的中心，更是近代以來的世界權力的中心所在，而歐洲主要國家更為主宰權力的大國；然冷戰期間的雅爾達體系，形成美蘇強權的兩極對峙，惟在冷戰後，蘇聯的國際地位及名器雖由俄羅斯承繼，對外並採取一邊倒的親西方政策，亦無法扳回蘇聯之勢力範圍的分崩瓦解，是以導致國際體系內出現區域的權力真空現象，各主要大國相繼透過外交的運籌帷幄，俾在重新擘劃國際體系的權力架構及新秩序。

國際社會中的每個國家無不藉由外交的折衝、權力運作，以謀取國家的最大利益，是以歐盟在冷戰後得以經由經濟結盟經積極運作後，成為政治合作，並在地緣上與美國、俄羅斯、中共、日本等國，相互爭鋒及較勁，相對在政治、經濟、軍事及安全等議題上，形成互相影響及牽制的國際政治態勢；就權力政治的整體性而言，呈現「一超多強」格局；以經濟實力而論，凸顯美、歐、日的三強鼎力，而中國大陸有後來居上之勢；論及國際政治的政治大國則是美、俄、英、法、中的「多極化」格局，惟德、日兩國正醞釀擴大聯合國安理會格局，使由經濟大國

成爲政治大國，並具主導國際秩序的功能。

冷戰後中共摒棄意識型態，改以國家利益制訂對外政策，並以「一個中心二個基本點」及「四個現代化」作爲政策的核心價值，另依據《中共二〇〇二國防白皮書》中對國家利益的敘述，在對外政策的目標上，最終目的在國富民強成爲世界大國；按「世界貿易組織」二〇〇四年的報告指出，二〇〇三年中國大陸是僅次於美國、德國的世界第三大貿易進口國，與東盟之經貿往來關係，直逼美國、日本，致使國家整體的綜合國力與主要大國差距，呈現日益縮減現象；另以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後勢預測指出，中共將會超日、德而趕美，成爲國際體系中惟一有實力挑戰美國霸權者；基此，藉與主要大國的經濟利益形成相互依存關係，而建立各種外交夥伴關係，進以表述中共倡議「和平發展」，並在「和平共處」及「獨立自主」的立場下，實踐「不稱霸、不出頭」的外交承諾，即爲中共當今國家利益所在。

中共爲避免不必要的崛起威脅論，「十六大」中央委員即學習大國興衰史，近更推動「和平崛起」理論，作爲「大國外交」的依據，以爲全方位外交策略考量；惟中共的大國外交，不但可以彰顯國際地位，凸顯在區域的重要性，更在實現「三步走戰略」，以達到全面小康的國家利益政策目標，在此前提下結合經濟全球化，不斷與美國、俄羅斯、歐盟、日本等大國和國家集團，從事經貿交往、投資合作，更運用預防及信任安全機制，進行對話以迴避對抗，期以邁向「和平與發展」之策略目標。

中共在對外關係上向來注重與周邊國家關係，從「以鄰爲善，與鄰爲伴」，發展爲「睦鄰、安鄰、富鄰」的「三鄰」政策，已在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後，使東盟國家對中共的態度立場，從遭威脅恐懼轉爲友善；另對歐盟及德、法等大國遂行元首外交及採取經貿利益，由具有敵意轉爲夥伴關係；基此，國際社會已視中共爲區域的強權國家，促使美、日、俄在亞太地區勢力範圍，猶如陸地的板塊移動般，似有鬆動的現象，對於傳統的軍事安全問題，形成隱藏性的危機。

中共國境綿長，與中國大陸接壤者多達二十九國，爲維護國家主權堅持不失寸土，是以冷戰期間的中印、中蘇、中越戰事，皆爲主權而戰；冷戰後，中共大國外交及經濟發展的和平攻勢，使得美國、日本與中國大陸保持密切的經貿關係，但在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及中共軍事現代化之後，促使美、日不得不重新審視中共在軍事安全領域，對亞太區域安全的威脅；再者，中共介入北韓核武危機的和解調停，顯然是意欲對東北亞區域安全，從被動瞭解轉爲主動斡旋，並由聯合

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成為對區域有影響力的政治大國。

現今台海安全及朝鮮半島的對峙，已為亞太安全的焦點，前者更是涉及中共所謂的「一個中國」政策下的主權問題，其在中共在遂行「大國外交」之際，早已藉由政府聲明或公報，強力主張「一個中國」立場，俾製造兩岸問題為「中國」的內部事件，藉以阻斷國際社會運用外交調停或和解處理的機會，形成以外交手段對兩岸問題進行圍堵策略，鑒於新現實主義強調，國家安全才是行使國際政治權力之目的，是以美、日惟恐禍及家門，遂重新修訂《美日安保條約》將中共視為重要的假想敵，衍生成亞太安全的「安全困境」狀態。

### 第三節 小 結

中共「十五大」以後，在江澤民主導下以「大國外交」作為，強化中共在國際社會的國際地位，並凸顯是為亞太區域的主要大國，但國際政治中從國家利益、權力平衡、相互依存的理論探討中，筆者發現中共的國家利益的核心價值，是在以經濟發展政策作為長久性利益，具體實踐上仍須與政策目標配合，尤其是在政策執行及目標管理上，為獲取最大利益實有其邊際效應存在，另牽涉外在環境的變化及時間因素的限制，使得整體的利益有侷限性，以致無法無限上綱；權力平衡在國際體系中運作，涉及國家個體在體系中權力分配及權力自主，再者體系結構的分合與反饋效應，使得平衡支點遠近影響施力及受力的比例，致使「權力平衡」反易形成另類的「安全困境」；相互依存是依附在經濟全球化的核心價值之下，而國家利益在面對國際體系的共同利益時，合作則是黏著劑，但是體系內所能製造的公共財，不盡然能符合眾意，使得因合作而相互依存的關係，在報價的驅使下呈現權力的競爭。

冷戰後初期，由於俄羅斯無法放下超級大國的身段，使得國家再度陷入內外交迫的窘境，基此中共在「十六大」後，體認到「大國外交」雖能發揚國威，但是國家的經濟及軍事平均實力，與美、英、法、日、俄等大國的仍相距甚遠，是以回歸現實的基本面，並殷鑑大國興衰，轉以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介入朝鮮半島核武危機、印巴核武危機，以成熟且務實的外交政策，處理國際事務，是為實現國家利益之整體目標。

國際體系結構的分分合合，權力架構及共同利益終會形成「均勢」，是以冷戰後中共先是蓄積國力，再遂行「大國外交」，無非是在體系內先是爭取大國的

一席之地，俟正式獲得國際社會承認；至後冷戰改主打「夥伴關係」外交，復輔以「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策略，是在建構國際民主機制的網絡，逐步建立國際體系的「多極化」格局，以反制單極化的霸權主義，無疑是在為「和平崛起」作嫁。

外交是國際政治關係運作上的妥協作為，是以中共在後冷戰的「十五大」期間，透過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綜合國力的提升，作為發展「大國外交」的必要條件，再以新安全觀積極表達對國際社會和平發展的義務與責任，以建立在國際社會中「大國」的外在條件，更依據國家的長久利益考量，遂在「十六大」告中，以「大國外交」作為對外關係的四大主張之首，再改善與國際體系中的主要大國既有的外交關係，從早期的建設性、友好性、合作性，以至建構戰略性的「夥伴關係」；二〇〇〇年春夏期間，中共更是繼俄羅斯後，分與歐盟、英國、法國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彰顯出中共在「大國外交」與「夥伴關係」之間的關係上，前者是外交政策上既定之目的，而後者則是外交策略運用之手段與工具。

針對中、俄兩國在冷戰期間由兄弟之邦，成為意識型態之爭的仇敵，直至冷戰後基於國家利益，雙方重新建立外交關係，再配合國際體系的合作理論以創造共同利益，使雙邊關係由敵對轉為一般國家，再逐步提升至友好，甚至成為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以及簽署《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整個外交策略運作軌跡，或許可深入觀察中、俄外交關係演變過程，再結合國際體系與結構的變遷與互動情形，進而從其衝突、妥協及進步之交涉、爭議等事件，或可以此作為大膽性的假設條件，再從中研究以利預測中共與其他大國間的外交與夥伴關係之發展情形。